



东亚学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历史学研究所

日本·亚洲研究中心

主编 盛邦和 李平民 章益国

东亚发展

——历史与价值

章益国 何爱国 夏雪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东亚学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历史学研究所

日本·亚洲研究中心

主编 盛邦和 李平民 章益国

上海财经大学“十一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平台建设项目

东亚发展

——历史与价值

章益国 何爱国 夏雪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发展:历史与价值/章益国,何爱国,夏雪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1

(东亚学研究)

ISBN 978-7-5642-1158-5/F · 1158

I. ①东… II. ①章… ②何… ③夏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东亚
IV. ①F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6228 号

- ☐ 责任编辑 张惠俊
- ☐ 书籍设计 钱宇辰
- ☐ 责任校对 胡 芸 卓 妍

DONG YA FA ZHAN

东 亚 发 展

——历史与价值

章益国 何爱国 夏 雪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960mm 1/16 17.75 印张 318 千字

定价:36.00 元

目 录

第一篇 东亚儒家资本主义论析

第一章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简史	(3)
第一节 “儒家资本主义”释名	(3)
第二节 日本成功的文化解释	(6)
第三节 “东亚奇迹”的文化解释	(11)
第四节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思潮化	(34)
第五节 本课题方法与价值	(41)
第二章 从“韦伯命题”到儒家资本主义学说	(43)
第一节 韦伯的“韦伯命题”	(44)
第二节 美国韦伯:柏森斯和贝拉	(64)
第三节 东亚韦伯: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76)
第三章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举证方法——以“勤俭论”为例	(87)
第一节 “勤俭论”概要	(87)
第二节 此“勤俭”与彼“勤俭”	(89)
第三节 禁欲主义	(94)
第四节 “勤俭论”与制度变迁	(97)
第四章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事实与价值	(104)
第一节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价值追求	(104)
第二节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传播的价值基础	(111)



第五章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与“亚洲论述”	(138)
第一节 “亚洲论述”的历史	(139)
第二节 “亚洲论述”的价值纠葛	(160)

第二篇 关于东亚发展的理论思考

第一章 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性	(167)
第一节 学术界对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认识	(167)
第二节 界定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性概念	(178)
第二章 现代化(发展)理论、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	(182)
第一节 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概念	(182)
第二节 现代化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	(185)
第三节 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186)
第三章 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188)
第一节 广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188)
第二节 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189)
第三节 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210)
第四章 关于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的深层思考	(212)
第一节 关于现代化问题的一些思考	(212)
第二节 关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些思考	(217)
第三节 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考	(219)

第三篇 儒学:伏流与一个大思潮的彰显

引言	(225)
一、由对孔子的再评价引申的话题	(225)
二、韦伯“登陆”中国	(228)



第一章 杜维明:儒学传统的“创造性建设”	(231)
第一节 重估东亚儒学中的现代精神	(232)
第二节 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	(236)
第三节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240)
第二章 余英时:韦伯命题的中国设问	(244)
第一节 儒学现代化困境的思索	(245)
第二节 儒学应对危机的手段	(247)
第三节 从传统与现代关系论儒学	(254)
第三章 金耀基:理性传统主义	(258)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	(259)
第二节 儒家文化与现代性	(266)
后记	(275)

第一篇

东亚儒家资本主义论析

第一章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简史

第一节 “儒家资本主义”释名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传统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流行学说。它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儒家伦理能促进经济发展,成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奇迹”。“儒家资本主义”或“儒教资本主义”,不是这一学说固定的指称,“后儒家假说”、“后期儒家命题”、“第三种现代化模式”等也是这一学说的别称,“东亚工业文明”、“东亚模式”、“文化东亚”乃至“亚洲价值”等名词,也会在一定的语境下包含这一学说的某些主张,有些场合有人把这一学说的主张者归入“新儒家”一派^①。

“儒家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含混的名称。就“儒家”(或“儒教”^②)一词而

① 方克立在为《孔子大辞典》撰写的“儒家资本主义”词条给出了如下定义:“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方克立:《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页)。方克立认为,当今中国的主要思潮都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化派主张全盘西化道路,“新儒家”主张的就是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笔者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方克立从政治主张角度把握“儒家资本主义”不同,本篇主要从学术主张的角度理解“儒家资本主义”。方克立把“儒家资本主义”定义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主张,本篇采取的视角则把“儒家资本主义”看作解释东亚过去历史的学说。为明确论题,本篇主要评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方克立主张的那种“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把它置于本文论域之外。就历史事实而言,东亚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新加坡等“四小龙”,都不能用“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来概括。

② 儒家是否宗教?是否可称为“儒教”?这不是本篇想介入的一个聚讼纷纭的老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一定的考察目的之下,称儒家为宗教(如韦伯《儒教与道教》);也可以在另外一些前提下,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不必执于名称之争。本篇在行文中,“儒家”还是“儒教”、“儒家资本主义”还是“儒教资本主义”,仅仅是顺承上下文而使用。



言,在中西对峙的语境下,“儒家”,往往不仅仅只指孔门之学,有时候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明”有时候更泛指整个东方文化圈,与“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等相对。但“儒家”可不可以代表“东亚”,进而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可不可以将东亚整个儿地拿来论述,这都是可以议一议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第五章中详细讨论)。

“儒家”一词隐含了一些理论预示(儒家可以标识东亚,东亚一定程度上是一体的);“资本主义”一词,则带了更多的迷混。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曾经批评:“儒家资本主义”一称,不是误用词汇,就是幻象^①。“儒家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内地惯常使用的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资本主义”一词有些不同。谢遐龄说“儒家资本主义”一称是误用词汇,意思其实是“儒家资本主义”与他预设的“资本主义”定义——也是我们习用的——不符^②。

“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范畴下,它的含义各有不同(如我们下文要讨论的,苏国勋曾经指出韦伯学说中的“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更是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③)。据布罗代尔的考证^④,较早在一个明确意义上使用它的是蒲鲁东,像马克思,尽管用了“资本家”、“资本家时代”、“资本家的生产方式”等,却从来没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该词被广泛使用,还是20世纪的事情,在桑巴特的《论现代资本主义》出版之后。黄仁宇曾经提到,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一词,是“充满政治气氛的字,一再滥用,实在不成体统,主张凡是‘有自尊心的学者’,应当将这字摒弃于他们的字汇之外,永不使用”。黄仁宇本人则认为,此议虽好,但苦无替身,该词一旦禁止使用,历史上就留下黑洞了^⑤。

这里我们如果就“儒家资本主义”一词的严谨性较真,也可能把该学说历史中的一些部分鄙弃入黑洞。“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符号。惟其被‘约定’,这种符号才获得了公共性;惟其是‘俗成’,这种符号又带有随机性。”^⑥“儒家资本主义”

① 谢遐龄:《评“儒学复兴”——兼论“儒家资本主义”及其他》,《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从本文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谢遐龄说“儒家资本主义”是幻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② 汪晖则倒过来认为:“在中国语境中,儒家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只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罢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于《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对这里“资本主义”一词,完全取消了它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意义。

③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④ 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2页。

⑤ 黄仁宇:《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载于《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5页。

⑥ 刘东:《“国学”与“汉学”》,载于《理论与心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就是这样一个既有“公共性”又有“随机性”的词汇。我们可以看看最具备大众色彩的流行娱乐报道中对它的使用。《金陵晚报》2002年3月15日一篇报道写道：“偶像组合F4在半年内，就为经纪公司创造了1.5亿元“台币”的收益，是棵硕大的摇钱树。但迷人的“道明寺”在《流星花园》中猛放一集“电”，只能得到1万元的酬劳，比电视台的普通员工还少。言承旭的反应则相当具有‘儒家资本主义’劳工的谦虚风范，他表示今年要更拼命，争取一集酬劳冲过6万元大关。”

既然在学者们的倡导下，“儒家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公共的流行语，那么，这个词的具体语义在流传中，就脱离了专家的人为酌定。像上文这类意义上使用“儒家资本主义”，你自然不必也不能用严谨的书斋精神去规范。太执着反而会成为“业障”，而影响我们对真问题的认识。看来我们得容忍“儒家资本主义”意义的暧昧状态了。有个叫阿尔伯特的报人弃世前看破红尘地说“世界上一切争论都是名词之争”；而早慧的哲学家波普尔在大约15岁时就明白了“绝不要争论词及其意义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争论是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不过他无可奈何地承认：“相信词的意义，尤其是定义的重要性的人几乎是普遍的。”^①我们总是习惯在研究之前，对研究对象下一个定义。其实，即使真要下个定义的话，在研究的最后得出这个定义也许才更恰当。这曾是韦伯的看法^②。

韦伯在中国学界曾经引起的误解和反对，一定程度上就与他使用“资本主义精神”一词有关。在中国，“资本主义”一词本身就能引起很多人的反驳冲动，也能引起某些人潜意识的倾慕。如果韦伯用《新教伦理与现代精神》之类的书名（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现代化理论风行时，把“资本主义发展史”之名置换为“西方现代化史”，又如杜维明那本涉及儒家资本主义的著作《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内地关于韦伯的讨论也许会本色得多^③。同样，正因为“资本主义”带着很浓厚的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色彩，不少人本能地否定“儒家资本主义”，就是冲着“资本主义”一词去的。其实，“儒家资本主义”的核心议题仍是“儒家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其中“资本主义”一词虽然有时在一定场合下会有所特指^④，但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学术讨论中，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烈。

① 卡尔·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② 参考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的开头部分。韦伯对能否给“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之类“下定义”有自己的看法。“宏大概念”难以定义是维特根斯坦等很多学者都说过的道理。

③ 关于内地学术界对韦伯的受容，韦伯怎样成为马克思的对立符号，以及这一种解读如何影响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在内地的流传，我们在第四章还要详细讨论。

④ 例如，方克立说的那种作为政治主张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



“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和“资本主义”两个歧义纷纭的词语连缀在一起。它的含义，虽然不是无边际的扩散，但也没有前后一贯的规定。在传播中，它既有断裂，也有错位，还有增值的情况。这个词，“儒家”和“资本主义”分别指称“中、古”和“西、今”，既暗含调和的期望，又充满了张力。笔者注意到，在像金耀基、杜维明、余英时这些被认为是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代表人物的著作中，直接找到使用“儒家资本主义”这个词的地方，倒是不多。

可以进一步说，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形式上用词的含糊与内容上的含混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陆玉林所说：“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不过是一个话题，而“儒家(教)资本主义”及与此相类似的“后期儒家假设”等也只是一种话语。作为“话题”或者“话语”，意味着并没有一群特定的人分享着、共有着或者共组着前后一贯的意见，而是说有人在谈论这个问题，声音众多，歧见迭出。就“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这个话题来说，截然不同的、分歧颇大的意见的存在不足为奇，“儒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个话题的一面而已，还有另外一面恰是对“儒家资本主义”的反驳或纠偏。而就认同或基本认同的“儒家资本主义”的情形而言，也是人言人殊^①。

本篇按一般习惯，在研究前作“儒家资本主义”的释名，着眼点却不是得出一个明确含义，而主要是揭示“儒家资本主义”一词的歧义性和感情色彩。因为，如果我们直接讨论儒家资本主义，那么，明确的定义也许是首要的；但我们讨论的是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史，讨论的是它的流传和它引起的争论。这样“儒家资本主义”的歧义性和感情色彩，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儒家”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能唤起某些人的排斥感和另一些人的亲近感，拒迎与否的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学说的理论内容，而在标识它的形式名词。我们要明了这些价值因素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本身的影响。

第二节 日本成功的文化解释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导源于学术史中的一个传统：对日本成功的文化解释。

日本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国家。很长时间内，它是唯一一个进入资产阶级现代化俱乐部的非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废墟上的日本成功复兴，完成了第二次起飞。日本的文化，通常也被看成是很独特的。日本经济

^① 陆玉林：《东亚的转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的发展,往往被认为打上了这种独特文化的烙印。

与这种看法有关的一个象征性人物是在日本有“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1840~1914),此人创立了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建立了东京会所商法讲习所(今一桥大学),一生努力从事日美间的“民间经济外交”。涩泽荣一后来逐渐成为了日本式经营的一个代表性符号,这个象征形象一手持着算盘、一手持着《论语》:把算盘而求富,绝非坏事。问题在于置算盘之基础于仁义之上。余从事实业50年,丝毫未离却此信念。恰如穆罕默德所言:一手持剑,一手持经文而临世界。及至今日,当一手持《论语》,一手持算盘^①。

《论语》、算盘,初看乃不相合之两物。然探究“富”的根源,以仁义道德及正义求富,其富必将永续长久。故将《论语》、算盘本来不相合的两物,合为一体使其一致,乃当世紧要之务^②。

涩泽荣一试图以“圣典”的权威建立日本式工商社会的精神秩序^③。他被认为是给以日本资本主义巨大的精神影响。每谈到“日本式资本主义”、“日本式经营”,就会提起他。

西方知识界运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日本,大概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动员知识界各方面的力量研究日本。在美国人看来,日本这个对手,与德国等同处西方文化之内的敌对国是完全不同的^④。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的策论式研究。这本书在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上的成功,直接引发了所谓的“日本人研究”热,被认为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⑤。同本尼迪克特一样,学者型外交家赖肖尔也是影响战后美对日政策的重要人物,赖肖尔还担当了驻日大使。赖肖尔的名著《日本人》(重版时改名为《当今日本人》^⑥),也十分注意从文化角度理解日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再次获得成功。“日本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随之升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达到高峰,并延伸至90年代。曾经流行

① 涩泽荣一:《论语讲义》(三),讲谈社学术文库1977年版,第45页。

② 涩泽荣一:《论语讲义》(二),讲谈社学术文库1977年版,第22页。

③ 参考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裔美国人遭受了德、意美国人未尝遭受的迫害,也许正说明了美国对异文化系统的日本莫名的恐惧、不可把握的感觉。

⑤ 《世界的日本人观、日本学总解说》,自由国民社1982年版,第260页。

⑥ 赖肖尔:《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一时的傅高义《日本第一》^①可谓这时的代表著作。傅高义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东亚问题研究所主任,美国学界著名亚洲问题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成功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冲击,《日本第一》的书名,就直观地反映了美国这种恐惧“第一”失落的心态。

在“日本人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日本与西方现代化的差异是形态上的,而非层次上的。学者们纷纷开始重新评价一度被视为前近代糟粕的家族制度、民间宗教等,认为这些东西正好为日本的现代化提供道德和精神基础。学者之外,记者、商人、作家在著作中反复强调,日本文化、社会和国民性格的与众不同,形成一种“日本特殊论”。中根千枝的《纵向社会》以其对日本“民族性”独到的理论阐释,成为此论的代表著作之一。后来,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首创者之一康恩就曾经引用中根千枝的日本论来证明自己的“新儒家”主张^②。

与“日本特殊论”一并风起潮涌的是“日本式经营”热。

关于“日本式经营”,1958年出版的詹姆斯·阿贝格伦的《日本的经营》^③是较早的一本经典著作。更重要的著作是美国日裔学者威廉·大内(一译乌契,William Ouchi)的《Z理论》^④,该书现在已经被认为是管理学中的经典。书中,大内选择了日、美两国的一些典型企业进行研究。这些企业都在本国及对方国家中设有子公司或工厂。大内认为,美国和日本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致其典型组织有所不同,大内分别称之为A型和J型。而日本的经营管理方式一般较美国的效率更高。因此,美国的企业应该结合本国的特点,向日本企业管理方式学习,形成自己的管理方式。他把这种管理方式归结为Z型管理方式,并对这种方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称为“Z理论”。

美国记者弗兰克·吉布尼1982年写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奥妙》^⑤,认为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将古老中国的孔子伦理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引进的经济民主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的结果。沃尔格的《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再论日本名列第一》^⑥是另一持类似看法的著作。作为西方人的观察,

① E. F.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2000年傅高义又出版对日本的最新研究《日本仍然第一?》(*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

② Herman. Kah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London, Groom Heim, 1979, P121.

③ James Abbeglen, 1958. *The Japanese Factory*. Glencoe, Ill. : The Free Press.

④ 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⑤ 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妙》,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⑥ 沃尔格:《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再论日本名列第一》,三联书店1985年版。



这些书在论述日本的成功时,对日本资本主义经营中体现的“东方文化特色”、“日本特色”都分外留意。

凡是“热”,总是有非学术的成分在内。“日本特殊论”、“日本式经营”的流行著作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非学术性的表述很多,感觉、情绪的描绘要远远多于学理分析。的确,这样的叙述容易为大众接受。但也有些学者有所反省。“日本式经营”热甚至让人有“热”过头的感觉:“其火热的程度,甚至使人们产生希望其降温的心理,或者主张将其视为一种危险的倾向,予以批判。”^①

从文化角度研究日本的成功著作,后来一部分在流传中——特别是在中国内地学术界——被安置在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学术谱系上。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以下若干:

一是罗伯特·贝拉:《德川宗教》。罗伯特·贝拉是美国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埃利奥特社会学教授,已出版作品除《德川宗教》(1957年)外,还有《超越宗教信仰》(1970年)、《被背弃的誓约》(1975年)、《粗野的宗教:美国宗教之间的敌对》(1987年)等。《德川宗教》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时副题为:“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该书应用帕森斯的理论,从宗教文化入手,通过对德川时期日本宗教状况、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析,揭示了日本传统社会以政治价值为中心的价值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已经构成日本现代化的文化渊源。这本书,我们下文还有专章论述。

二是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是一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热中产生过不少影响的著作(入选当时极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森岛通夫(1923~),早年在京都大学、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在日本大阪大学担任一段时间教授后,于1970年就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森岛被誉为是“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是入载马克·布劳克(Mark Blaug)的《凯恩斯以后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书唯一的日本学者^②。

《日本为什么“成功”》是森岛通夫1981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三得利丰田讲座”、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讲稿。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这是森岛这样一个有着国际地位的日本学者,在国外大学(英国剑桥)的讲座上,谈日本的成功。这本书,是东方人向西方人叙述东方的。不过,这本书还是转而在东方、在

① 三户公:《管理学与现代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② 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9页。



中国获得了广泛影响。

《日本为什么“成功”》开篇就把韦伯作为马克思的对立面提出：卡尔·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状况的反映。而马克思·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则阐明，与马克思观点完全相反的关系也能够成立。他认为：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一种经济类型，如果要求人人必须具有某种国民精神，而这种国民精神不适应某社会的既定伦理道德，这种经济类型就不会在该社会发展；而适应该社会伦理的经济则必然出现^①。

我们现在知道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关系要比这里说的复杂得多，他们不构成这样泾渭分明的简单对立。但是，这样从马克思的对立面理解韦伯，倒是契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普遍的韦伯认识（见本篇第四章），这大概也是此书能在中国发生较大影响的原因。

森岛通夫原是以数理经济学闻名的，《日本为什么“成功”》却和他早年习用数理方法的精密细微迥然异趣。该书从文化比较大视野入笔。“用马克思·韦伯观察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视角考察日本”。森岛通夫认为，日本自古以来即有其自身的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了日本人的气质，日本社会非常受其独特的社会精神的支配。其中，儒教也是日本意识形态中的重要部分。日本的儒教虽然来自中国的教典，但由于学习方式、态度的不同，在日本酿成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国民气质。这种国民气质、文化特质，造就了日本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支持了日本的“成功”。《日本为什么“成功”》就在这种文化的视角下，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作了史的考察，从大化改新一直叙述到二战后日本的成功复兴。

在比较宗教学的基础上，建立比较经济体制论，是森岛通夫的写作此书的一个课题意识。森岛认为，韦伯的世界宗教研究是在这样的宏大构想下展开的。当然，他自己学力无法承担这项工作，但他希望《日本为什么“成功”》可以作为这项研究的“日本篇”。

三是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副标题为“日本人为何拼命工作”，1980年出版，1984年便出到了第20版。尽管此书只在一处提到了韦伯的名字^②，但无论从书名还是内容来看，山本写作来源于

① 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页。该处称韦伯也提到了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山本用“华侨资本主义”一词）。



韦伯的启示。山本把所谓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于德川时代的商人文化中的某些观念,如勤勉、敬业、自制、节俭等,认为在那时,“经济合理性已经是一个公理”^①,这构成日本近代成功的文化前提。该书把铃木正三、石田梅岩当作缔造现代日本的两位思想家,指出在日本人心中,工作不单单是一种经济行为,而往往是为了某种宗教性意义,为了精神上的欣慰而拼命工作。

山本七平不是一个专业学者而是一个书商兼畅销书作者(他的作品《圣经常识》、《日本人是什么》都有不俗的销售业绩)。这本书笔调虽细腻但松散,采用非学术性叙述,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上文所说,这是“日本特殊论”、“日本经营论”流行中的一个特点。

第三节 “东亚奇迹”的文化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日本成功走上复兴之路外,其他一些如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也随后而上,取得了世人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成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试图给这一成功一个文化上的解释。

学术界从文化上解释日本成功的传统,可谓是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前奏。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是把这一传统的论域从日本一国推及东亚。论域的扩大,也带来棋局的开阔。“日本成功的文化解释”多从(日本式)经济管理风格的动力结构分析,而儒家资本主义解释“东亚奇迹”,却更多地从文化比较的恢弘视界入手。当然,两种学术视角互有渗透,但对比而言,还是各有特点的。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介绍中清晰品味出来。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最早和最主要的几个持论者。

一、西方学者

(一) 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

康恩(1922~1983)是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创办人。他是位国际政治学家、军事战略学家,以《论核战争》(1961年)等书出名。他还是未来学(如果有这么一门学科的话)的创始人,提出过所谓的“大过渡理论”。

康恩在1979年,出版了两部相互关联的书。一本是与其赫德森研究所的同事佩(Thomas Pepper)合作的《日本的挑战》,该书以日本为对象,探讨了资本主

^① 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5页。